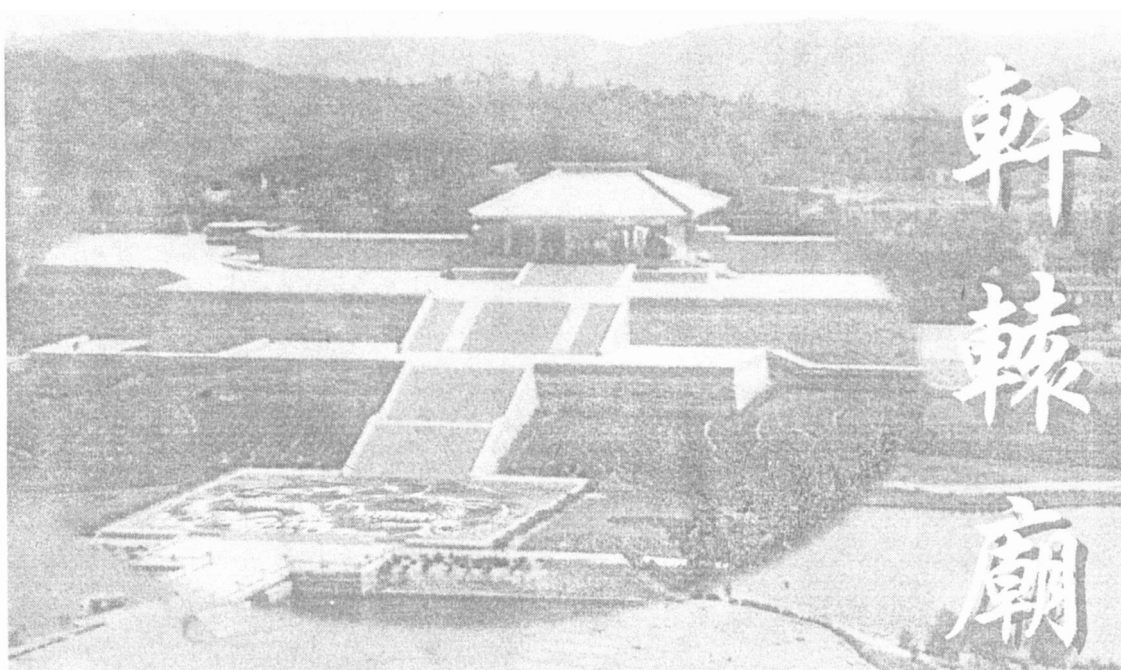


心祭重于形祭

□ 张岂之



我这里所说的“祭”，指的是每年清明节，我们在陕西黄陵县黄帝陵举行的祭祀人文初祖黄帝的礼仪活动。

关于是否需要由政府出面组织这些祭祀活动，即“公祭”，有学者曾经提出否定的意见。他们主张全部祭祀礼仪都由民间举办，即“民祭”。我主张沿袭旧制，维持公祭。但是，就目前公祭礼仪的效果看，似乎需要一些改进。

一、祭礼改进的必要性

在20世纪80和90年代，我多次到黄陵县黄帝陵参加当时陕西省人民政府主持

的清明日公祭活动。祭祀结束以后，和其他参祭的人交换意见，反思祭祀礼仪，大家都觉得这样的祭祀活动似乎缺少点什么。参加祭祀的人，以及观礼的人，好像在心灵里没有引起多大的触动，也没有在思想和感情上引起丝丝波澜。

政府有关部门很重视每年的黄陵公祭活动，认为这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有重要意义，希望在祭祀仪式上有所改进，让参加祭礼的人，以及那些观礼的人，都能真正地受到一次“慎终追

远”的教育，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加以发扬。这个立足点是正确的，我们应当努力使之更好地实现。

但是，如何通过祭祀活动的举行而真正达到这个目的，却需要进行一些研究，做一些努力。从已经举行的祭祀礼仪看，我们也许可以肯定，我们以后的祭祀礼仪，不能只是参照古时的祭祀典礼，或者完全仿照古代。这样做，既不怎么切合实际，效果也不是很好。

大家都知道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许许多多的礼仪都发生了变化。后来的礼仪，对于前代的礼仪，无不有因革损益，这就是礼仪上的继承和发展。在祭祀人文初祖的礼仪上，也应该有因革损益，不可以完全照搬或照抄古代的礼仪。当然，学者们就中国古代的祭祀文化进行学术研究，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加以借鉴，是有必要的。

从祭祀黄帝陵的实际效果看，每位参加祭祀的炎黄子孙，有多少人在祭祀中真正受到了有效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教育？真正在思想情感上有所触动？而且能够把这些情感较长时间地留在心中呢？我不敢说完全没有。从海外归来的炎黄子孙，肯定会有这样的感受，而在大陆生活工作的同胞们，又有多少人真正感受到“心祭”的收获，在思想感情上引起共鸣？恐怕不多吧！

在我看来，我们每年的祭陵活动，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。究其原因，可能主要的并不在于我们对古代的礼制了解不多，或者我们仿照古代的祭祀礼仪不够。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，我们在举行黄帝祭祀礼仪时，“形祭”大于“心祭”，甚至“形祭”代替了一切，缺少在祭祀中令人

感动的“心祭”。这就把祭祀活动中的本末问题搞颠倒了，结果，自然也对祭祀礼仪的实际效果产生了影响。

二、“心祭”重于“形祭”

什么是“形祭”？什么是“心祭”呢？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就需要分析一下祭祀礼仪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。这种分析，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，就已经隐约地出现了。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“本末”。

春秋时期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，社会生产关系相应发生了变化，引起礼仪制度的变革。西周时期制定和实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周礼，或者废弃不用，或者成为虚文。“礼崩乐坏”，是对这种礼仪变革历史情况的恰当描述，“天下无道”，则是孔夫子对于这种礼仪变革历史状况的价值评价。孔夫子曾经说过很多批评当时违背礼仪原则或精神的话，这些话表现出他对礼仪活动中“本末”的看法。

孔子感慨说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”孔子的意思是说，礼仪活动，难道只是那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礼品吗？他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，人们在进行礼仪活动时，内心还应该对礼仪活动对象有真正的内在感情。他将这种内在真实的感情叫做“仁”。在孔子看来，在各种礼仪活动中，礼品、礼仪等，都是有形的表面的东西，真正重要的是施礼者、参礼者以及观礼者内心对于行礼对象的内心情感和真实感受。

比如，孔子讲孝敬父母这种礼仪，子女同样地给父母饭吃，但如果子女对父母没有必要的、真正的尊敬和情感，没有孝心，那么，赡养父母这种行为和

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？

在这个例子里，赡养父母的行为，是有形的礼仪活动，是孝敬父母的“末”，它只是外在表现；尊敬父母的情感，是无形的心理活动，才是孝敬父母的“本”，是礼仪的根本之所在。在孔子看来，两者互相比较，无形的心理作用比有形的行为活动更加重要。

根据这个思想，我们在祭祀黄帝时，也应该说，无形的心理感受活动（“心祭”）比起有形的礼仪行为活动更加重要，“心祭”重于“形祭”。

“心”和“形”相对而言。在黄帝陵祭礼中，有形的礼仪，如人们在陵墓、庙堂等处的行礼仪式、排列组合、先后程序等，都属于“形祭”。而无形的礼仪，如以黄帝为契机，反思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，从而增加爱国心和民族凝聚力等，这些都属于“心祭”。

所谓“心祭”，在黄帝祭礼中，指我们施礼的人要用我们的心，用自己对于民族优秀文化的真正认识、真实情感来实施礼仪活动；我们参礼的人，也要用我们的心，用自己对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，来参加礼仪活动；通过这种以真性情为基础的“心祭”，使所有观礼的人，也能受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感染。

重视“心祭”不是说不要“形祭”。这两者并不截然对立。它们共同结合起来，才可能构成完整的、理想的祭祀活动。“形祭”只是祭祀活动的表现形式，“心祭”才是祭祀活动的实质内容。有“心祭”而无“形祭”，这样的祭祀活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。反之，只有“形祭”而无“心祭”，就会缺失祭祀活动的真正意义，这是我们要力求

避免的。

从黄帝陵祭礼发展的过程上说，先要发展“形祭”，等“形祭”发展到一定阶段时，“心祭”就成为更加迫切的需要，而“心祭”本身也成为祭祀礼仪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标志。

三、如何加强“心祭”

以前的祭陵活动，主持者花了许多精力在祭祀礼仪上，非常重视有形的祭祀礼仪建设。这是必要的。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只讲“形祭”，不大讲“心祭”。举行祭祀活动时，只要祭祀进行顺利，一切仪式符合预先的设想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在效果上，只要在祭祀当日电视台的“新闻联播”节目中，有一个镜头出现即可。至于观众对这个或几个镜头是否重视，也就不大考虑了。

这种状况，及其效果，似乎离我们祭祀人文初祖的目的还有不小的差距；而这种不重视甚至忽视“心祭”的状况，也不利于黄帝陵祭祀礼仪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。

我们不是古代祖先神的崇拜者。我们祭祀黄帝陵，不是把黄帝当成神灵来祭祀，而是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，追思中华民族先辈们如何创造文明，如何造福子孙。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他们的事业，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1世纪真正实现。因此，我们的祭祀，在形式上也应当是人文的，而不是神化的。

如何使“心祭”做得更好？这需要主办此事的公务员们和学者专家们一起来研究。

我想，这需要在以下几点上费些心思：

第一，将祭祀礼仪活动，明确看成是一次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活动，看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陶冶活动。在此基础上，祭陵才有可能在认识上切实产生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效果。

借助祭祀活动，充分利用文字、图像、音响、线条等各种方式，如报纸、杂志、书籍、图片、连环画、摄影、摄像、VCD或DVD等，加强宣传，提高施礼者、参礼者、观礼者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认识，加深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体验或感受。这是加强“心祭”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第二，最好不要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古代的祭祀礼制或礼仪上，而应该放在建设符合新时期的新礼仪上。

实际上，任何礼制礼仪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。过去的朝代那么多，我们应该模仿哪一个或哪几个朝代呢？我们如果模仿唐朝祭祀礼仪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模仿明、清等其他朝代呢？我们如果说不出这样选择模仿的道理来，就会影响到祭祀礼仪的正当性，也会影响到祭陵活动的有效性。而且，从历史上看，由繁趋简，是礼制礼仪演化的必然趋势。在新时期完全引用古代的礼制礼仪，很难产生深入人心的感染力。我觉得不宜搞仿古的礼制，只能借鉴一、二。

第三，在祭祀人文初祖的新礼中，一定要配合乐曲。乐曲是抒发人的感情，是心灵美化的艺术力量。世界上精致的、成熟的宗教，都有其独特而感人的音乐做支撑。祭陵活动不是宗教活动，更不能离开优秀乐曲作铺垫。

我想，祭祀黄帝陵的乐曲，在思想内容上应该是歌颂中华民族精神的；在艺术形式上，词与曲都应当有美感，有感染力，能够令参礼者、观礼者通过乐曲的

美，进一步充分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神圣、生机与活力。可惜这样理想的祭祀乐曲至今还没有产生。祭陵的乐曲如果能成为中国人喜欢的乐曲，那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祭祀黄帝陵的礼仪活动真正达到了目的。

我想起一个例子。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春节晚会上，由黄霑先生作词的《我的中国心》，这首歌感人的旋律，配合着震撼人心的歌词，使人听后有余音绕梁、三日不绝之感。我至今仍时常想听这个歌曲。

我们每年清明祭陵，产生过感人的乐府华章吗？似乎没有吧！其实，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。

陕西省有西安音乐学院，我们有便利的条件请词作家、作曲家、演奏家们发挥他们的创造才华，创作出能打动人心的祭祀乐曲来。我相信，只要给以机会，他们是可以创作出美的祭祀乐曲来的。在祭祀开始前、进行中以及结束后，都有乐曲伴随播放，肯定可以极大地丰富祭祀礼仪的内容。如果祭祀乐曲能出现精品，用以提升我们祭祀礼仪活动的文化品位，增加祭祀礼仪活动的“心祭”比重，我想，清明祭陵的效果，一定大为改观。

此外，在祭祀黄帝陵的礼仪程序上，我建议，祭祀礼仪的项目不能太多，礼仪程序不宜太长。一个人的精力、体力总是有限的，主祭者、参祭者、观礼者也是如此。时间太长，如果他们感到疲倦，必然会影响到祭祀礼仪的进行和效果。

最后，祝愿清明祭黄帝陵活动取得更大的成效！

2005年2月初